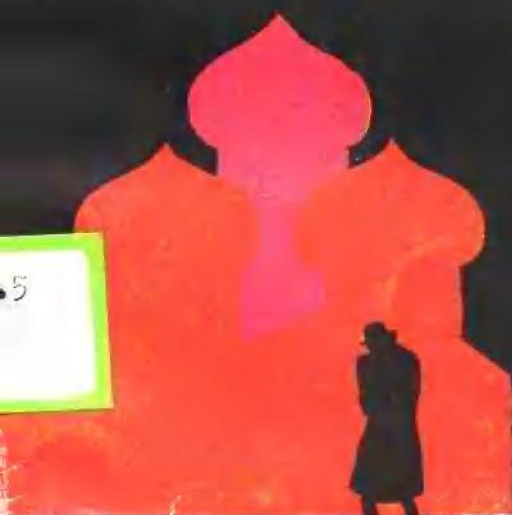


YUGENDEREN

THE
PEOPLE
WITHOUT
ROOTS

无根的人
树葵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施浩祥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无根的人

树 菜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4 字数 209,000

1990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21-0516-4/I·419 定价：3.7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题材独特而鲜见的长篇小说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在已沦为“孤岛”的上海法租界上，有家白俄开设的“康司坦诺维奇爵邸”，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在这里激烈地展开着。本是寻欢作乐的艳邸，此刻成为威逼利诱的魔窟。漂泊来我国东方大都市上海的俄国人，虽然有的过去是达官贵族，现在为生活也在倍受煎熬；有的则沦为日本特务，为日本间谍机关刺探美国破译密码的“魔法行动”充当鹰犬。不同国籍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纯真恋情，被挟裹进政治斗争漩涡，生离死别，不堪回首……作品情节曲折，悬念迭起，可读性强。

第一部

1941・10

—

萨巴罗夫扳下电闸，装在门外的那个霓虹灯招牌倏然熄灭，隔着那扇磨砂玻璃门透进来的红红绿绿的亮光，也就随之消失了。

现在只剩下一盏暗淡的灯光照着这间空荡荡的店堂。那个管酒吧的姑娘赛琳娜，还在那张长台后面把一些次货威士忌和白兰地，分别灌进那些名牌酒的瓶子里去。这是这家酒吧的老板耍的花招，但他这一手玩得也挺谨慎，每回都只按瓶里所剩真货的数量掺进一小部分假货，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，绝不多掺。赛琳娜还受到特别嘱咐：只有碰到那些对她色迷迷地动手动脚、或是已经喝得七八成醉的顾客时才能斟这种酒。在这样精心的安排下，一年多来，这兑次酒的花招从没露过馅，至少萨巴罗夫从没听到有哪个顾客为这桩事在店堂里吵嚷过。

萨巴罗夫再检视了下挂在门闩上的那把铁锁，在确定已经锁牢之后，便转身朝店堂里走去。他一路上碰到那些还在地上的椅子，便顺手把它们翻到桌面上去。这本该是酒吧里那几个女侍的活儿，但打烊之后她们都急于更衣回家，因此在清扫店堂的时候，往往会有所疏漏。

他走到店堂中间那张酒吧柜前时，赛琳娜叫住了他，从柜肚里拿出桦叶牌伏特加和一只大号高脚杯，斟了杯酒推给他说道：“喝了吧，上校。”

“谢谢你，好姑娘。”萨巴罗夫举杯一饮而尽，抬起手抹掉嘴角边的酒渍，伸过手去轻轻拍了拍赛琳娜的脸颊说。赛琳娜是个犹太姑娘，萨巴罗夫很喜欢她，这不仅因为她的身世和遭遇值得同情，还因为萨巴罗夫有着和她同岁的独生女儿——娜嘉，两人的身材和面貌也有点相像，只是赛琳娜是黑发而娜嘉则长着头棕发罢了。

这家青鸟酒吧的老板尤塞夫·萨诺维奇，此刻正坐在店堂角落里那张收银柜后面计算账目。他打开了那台收银机，把这一天里塞进去的钞票一张张拿出来，小心地按照不同的面额分别叠起——不管是“法币”还是“中储票”，都按照票面理到一块。有少数顾客是用外币付账的，他便不再进行分类，只是把那些美元、英镑、法郎、马克，也不分纸币或硬币，全都丢进旁边一只小铁箱里，留待以后再仔细清点。他在整理那些钞票时，无论从面部表情或手指的动作上，都能看得出他心中那种掩饰不住的喜悦。

萨巴罗夫走过尤塞夫面前时，把那把大门钥匙放到收银柜上，说过声“再见”，便从后门走出了店堂。

在店堂和酒吧后门之间有一个小间，是用来堆放台布、餐具和各种杂物的。店里的雇员平时也都在那里更换衣服。当萨巴罗夫脱下那顶缀有金辫的制帽和那件钉着金属纽扣制服上衣，正打算穿上自己那件藏青色暗条花呢上衣时，忽然听到隔壁的店堂里传来尤塞夫的声音，那是在对赛

琳娜说话：“你怎么今天又给他喝酒了！照这样下去，他会当作是他份内应得的呢。”

接着，是赛琳娜的声音，并不太响却能听得清楚：“一杯伏特加的成本没多少，上校有风湿痛，喝一杯对他的腰腿是有好处的。”

“上校！你老是叫他‘上校’。”又是尤塞夫的声音，“这是我们在顾客面前帮他吹的牛，你倒信以为真啦，鬼才知道他以前当过什么，也许是个上士，也许只是个勤务兵或者马伕。”

一股怒气从萨巴罗夫胸中升腾起来，他想冲进店堂里去，指着那犹太佬的鼻子将他痛骂一顿，要是他还敢出言不逊，那就让他尝尝自己这个老兵的拳头的滋味，但在再考虑了一下之后，又把刚才那种冲动压下去了。砸掉了这只饭碗，到哪里再去找这么个司閤的工作呢？在这里，固然有时候要受这个犹太佬的气，但工作毕竟不算太累，就只要在门前向那些顾客鞠上个躬，再欠身为他们拉开门。要是运气不错，多碰上几个出手阔气的顾客，那么一晚上得到的小费加起来也颇为可观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原来那股火气便逐渐消退下去了，穿好衣服，嘟囔着骂了声：“犹太鬼……阿巴公”^①，拉开那扇后门走出了酒吧，然后“砰”地一声使劲地把门碰上，这样也多少算出掉了些憋在胸中的闷气……

这扇后门开在弄堂里面，走出弄堂，便到了霞飞路上青鸟酒吧的前门口了。这一段路上的店铺都已经打烊了，只

① 莫里哀名剧《怪客人》中的犹太放高利贷者。

有马路斜对面那家九层楼的伟达饭店门前，霓虹灯广告还亮着，门前停着一排十多部三轮车，那些车夫都聚在门前在 大声地谈话。这家旅馆的底层开着家小型舞厅，此刻已临近散场时分，那些三轮车都是特地赶来招揽乘客的。

萨巴罗夫朝西面慢步走去。毕竟已是仲秋时节了，阵阵晚风迎面吹来，不禁使他感到有些凉意。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支雪茄，点着了慢悠悠地吸起来。这支雪茄是今天晚上一位矮胖的中年顾客在门前给他的，上面那只印着牌号的纸箍已掉落了，所以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牌子，但凭着感觉判断，这是种烟味醇和的高级吕宋雪茄，不是“亨白”便是“老美女”，最差也不会低于“克罗那”。

他走到毕勋路口上，正打算朝南拐弯，迎面走过来两个担任夜间巡逻的安南巡捕，倒掬着马枪，沉重的皮靴踩在人行道的水泥板上，发出匀称的节奏。萨巴罗夫由于常年站在青鸟酒吧门前，因此对这两个经常在霞飞路上巡逻的巡捕是认识的，于是，便站住了向他们点头招呼，但那两个巡捕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，只朝他瞟了一眼便擦肩走过去了，其中一个的脸上还现出了个轻蔑的冷笑。

萨巴罗夫怔了片晌，转过头望住那两个背影骂了声：“亡国奴！端点什么臭架子！”这才拐弯走上了毕勋路。走出了一段路，他把点着的雪茄在路边的电线木杆上揷灭掉，把剩下的那半截小心地放进上衣里袋。这样的好烟一口气抽完太可惜了，应当留下一些在明天午餐之后，再仔细地品味和享受一番。

走完这条毕勋路，向左拐弯便是他住处所在的祈齐路

了。在两条路和西面那条蓝思安路的交会处，原来有一块供行人小憩的街心花园，由于那花园是三角形的，附近的居民便习惯地把那里称做“三角花园”。四年多前，住在附近一带的白俄居民联名上书法租界工部局，请求批准由俄侨自行筹款，在这里建造一座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。这项请求获得批准之后，便着手捐募集资、设计、动工，到1937年2月才落成。这座纪念碑是由一位俄侨雕塑家设计的，碑座用花岗石砌成，周围栽种着小冬青树；碑身是立体式三角形的，三面用中、俄、法三国文字镌刻着亚历山大·普希金的姓名和生卒年月，顶上还有一尊普希金的头像，表情深沉地凝视着前方。萨巴罗夫当时刚从哈尔滨迁来上海，并没有轮到在那份送呈法租界工部局的请求信上签名，但在募集建碑费用时，却也解囊捐献了40块钱，因此他感到在这座碑上也凝集着自己的一份心意，每回经过这里，总要伫立着朝那尊头像望上一会。他这样做倒并非出于对这位天才诗人的崇敬，说实话，在普希金的作品中，除了《上尉的女儿》那本小说以外，其余的他都没有读过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感受一下和那个也许是永远无法重见的故国的联系——虽然这种联系是显得十分朦胧甚而抽象的。

走过了普希金纪念碑，前面几十米处便是萨巴罗夫所住的那条弄堂了。那条弄堂名叫茂龄别墅，里面有二排共18幢上海人通常说的“单开间三层楼弄堂房子”，由于里面装有带浴缸的卫生设备，不用像那些住在旧式里弄的居民那样，每天清晨要拎着马桶出来倒粪便，所以这类房子就被划归为“半新式里弄”。萨巴罗夫住在第一排最后一幢房子的

二层楼上，楼下住的是一个单身的菲律宾乐师，在静安寺那家有名的百乐门舞厅里吹黑管，他楼上住的也是个白俄家庭：一对夫妻带着个孩子，男的在一家英国洋行里当汽车司机，女的则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当女侍，一个12岁的男孩子还在上小学。因此对于占上海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，这幢房子里住的都是外国人。不仅如此，在这茂龄别墅的18幢房子里，住下的外国人不下于30户，其中大半是萨巴罗夫的同族，还有十来家犹太人和一对中年吉普赛夫妇，那个男吉普赛人在家里开着家星相馆，专为人家占卜算命。这些人连同住在附近几条弄堂里的另外几十家俄国人、犹太人和吉普赛人，在租界巡捕房的户口登记册上，都属于“无国籍侨民”。

萨巴罗夫走到自家门前，掏出钥匙开了门。虽然现在时间已过了深夜11点钟，但住在楼下那个菲律宾乐师，还在舞厅里上班；而三楼上那位女主人，也照例才下班到家，因此萨巴罗夫在关门和上楼时，都不用担心会惊醒了谁。他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才开亮电灯，便知道娜嘉今天回来过了，床上原来挺凌乱的被子折叠得十分整齐，桌上、窗台上和地板上也都经过了一番整理和清扫，房间中间那张方桌上，放着只装奶粉的铁罐和一瓶酒，瓶下压着张纸条，上面是娜嘉的字迹：

爸爸：

面包在碗橱里，烧汤的牛肉和土豆也给你带来了，你明天只要买点番茄和卷心菜就行了。明天

晚饭我们那里有人要来请客，我要留下帮忙，所以要后天才能回来了。

康司坦诺维奇夫人要我向你问好。

娜嘉

萨巴罗夫打开那只奶粉罐头，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罐糖炒栗子。这东西是萨巴罗夫到了哈尔滨之后才头一回尝到的，以后便成了他最爱吃的一种零食，每年秋季栗子上市，总要饱啖上几回。现在这些栗子都已凉了，味道当然不及刚出炉的香糯可口，但也总是聊胜于无，能一快朵颐了。

萨巴罗夫脱下西装和皮鞋，换上睡衣和拖鞋，穿上毛巾布浴袍，打开娜嘉送来的那瓶中国烧酒，斟上一杯，开始剥着栗子喝起酒来。

一整天里，只有这段时间，是他最舒适、最安详，同时也是神经最为放松的，他不用站在酒吧门前紧张地左顾右盼，一面为进出的顾客拉门，一面还得随时准备着抢步上前，为那些坐汽车来的顾客拉开车门伺候他们下车；他也不需要一直绽出副笑脸，迎接顾客并且在接受他们赏赐的小费时，深深地鞠下躬去，同时在这些时刻里也可以不再看到尤塞夫那副讨厌的嘴脸了……

凭心而论，除了那吝啬的性格以外，尤塞夫并不是个太苛刻的老板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他对待自己的雇员还是比较和气的。只有在他感到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，才会变得不近人情起来，刚才他在赛琳娜面前攻讦自己的那些话，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说出来的……

尽管一路走回家来，他对尤塞夫刚才攻讦自己的那些话已逐渐地释怀了，但此刻再想起来时，却仍旧不免有些生气。确实，他并不真的是什么上校，那个头衔只是为了迎合某些顾客的虚荣心理才这样叫出来的。但尤塞夫也该知道得清楚：他——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萨巴罗夫并不是什么上士，更不是什么勤务兵或是马伕，他是个道地的炮兵连长萨巴罗夫上尉，在欧战中由于作战勇敢曾被授予圣尼古拉奖章——这些都是货真价实，不容置疑的……

萨巴罗夫虽出身于平民家庭，但几代都是当兵的，祖父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禁卫军里的一名中士，退役以后给一位公爵的领地里当管事，专管向佃户收租；萨巴罗夫的父亲20岁便被征入伍，在远东军团里服役，期满后又转为志愿兵。在1904年的旅顺口战役中被日军炮火击中阵亡，当时他的军职是上士副排长。为了表示对殉难军人的恩恤，根据沙皇的旨意，18岁的萨巴罗夫和另一些殉难军人的子弟，被送进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这样，在几代从戎的萨巴罗夫家族中才出现了第一个军官。1914年欧战爆发时，萨巴罗夫已是一个炮兵连的中尉副连长了，两年后，又擢升为上尉连长。大战结束以后，他从匈牙利回到俄国，便参加了邓尼金将军的部队，在斯摩棱斯克同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作战。一年多以后，当时的战局使他明白了大势已去，任何想要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做法都是徒劳的，于是便和几个同事一起脱离部队，溜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^①。在那里耽了一年多，眼看着红

① 即海参崴。

军又要追击过来，便又溜到了中国的哈尔滨，在那里开了家小杂货铺，娶了个逃亡出来的白俄罗斯小贵族的寡妇做妻子，接着便生下了娜嘉。在女儿4岁那年，他妻子跟一个来自彼得堡的纨绔子弟私奔跑到欧洲去了。于是就剩下萨巴罗夫和娜嘉两人相依为命地过着日子。又过了几年，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，在开头一两年，这里白俄居民的处境同原来相比并无多大两样，因为日本军方同白俄中的大多数人，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的立场还是一致的，但逐渐地情况起了变化，日本人除了把一部分白俄收罗去当了他们的鹰犬以外，对其余的人在生活和经济上的限制也越来越严，失业的白俄也逐渐增多。随着中国百姓生活的日益贫困和货源的缺乏，萨巴罗夫的那家小杂货铺也支撑不下去了，只能收歇掉买卖，在四年多前带着17岁的娜嘉南迁到了上海。

到上海之后，首要的问题是要找个职业，这次的搬迁已耗掉了他的大部分积蓄，再加上海滩上较好地段的店面租费都昂贵得惊人。这时，在哈尔滨时就认识的那个妓院老板卡特琳娜·康司坦诺维奇伯爵夫人也搬来上海了，她的交游要比萨巴罗夫广阔得多，于是便设法替他谋到了那家青鸟酒吧里当司阍的职位。就这样，他在那里一直干到现在。

搬来上海之前，娜嘉已经在哈尔滨唯一的那所专为俄侨子女开设的中学里毕了业，来到上海之后，上大学当然是与她无缘，像交通、复旦、暨南那些中国的国立大学里，是概不招收无国籍学生的，想要上震旦、沪江、圣约翰那贵族化

教会大学，那笔学费也决不是萨巴罗夫负担得起的。在头两年里，娜嘉干过好几种职业：咖啡馆女侍、渔具店售货员、电影院领票女郎……同时还在一家英文夜校里读书。娜嘉的英文学得挺不错，但工作却并不顺利，不是因为反抗某些顾客的非礼行动而丢了饭碗，便是由于店铺倒闭歇业而失去了工作……最后，还是那位妓院老板康司坦诺维奇夫人雇用了她。她提出愿意雇用娜嘉，帮她处理妓院里的一些杂务，如向食品店订购食品，采办各种生活用品，向裁缝店定制姑娘们所穿的各种服装，指挥女佣们清理打扫，等等，同时还要结算一些零星账目。对于这样的建议，萨巴罗夫是颇费了一番踌躇的，虽然康司坦诺维奇夫人向他保证过：绝不把娜嘉当作院里的那些姑娘看待，她纯粹只是自己的一个帮手，自己也决不会让任何客人对她进行侵犯。但萨巴罗夫总觉得在那种地方做事，说出来名声总不大好听，会影响娜嘉日后谋职和婚姻方面的选择。直到康司坦诺维奇夫人对他说过那番话之后，他才逐渐消除了原来的顾虑，同意让娜嘉到那里去帮助她照料杂务的。康司坦诺维奇夫人是这样对他说的：“……别以为在人家眼里只有我那儿的那些姑娘才是婊子，老实告诉你，在那些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法国人，还有那些中国人的眼睛里，我们那些在咖啡馆、酒吧间里做事的姑娘也全都是干那一行的，只要给钱，全都肯跟着上床的。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人从门缝里瞧人，谁叫我们在这里只是些漂来的浮萍，连个国籍也没有，就连一张最起码的身份证也拿不出呢！对那些连国籍和身份都没有的人，人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看法呢？你别以为娜嘉来给我当了

助手就会被人家看轻了，说实话，在上海的那些同族人里头，三等九流，都和我那里是有些关系的，日子长了点，人家很快就会弄清楚，在我那里，当姑娘的是当姑娘，当帮手的是当帮手，完全是两码事情，只要在上海的同族人都明白这一点，那些外国人、中国人是什么个看法和什么个议论，都和我们的娜嘉有啥关系呢？”

……萨巴罗夫喝了口烧酒，又剥了颗栗子丢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。吃喝着这些东西，他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娜嘉，但还是那个一直回萦在心上但却没说出口来的老问题：难道就听任娜嘉一直照现在这样过下去吗？到什么时候和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她有个比现在好一些的命运呢？……

二

卡特琳娜·康司坦诺维奇伯爵夫人正在卧室吃早饭。她穿着那袭心爱的黑丝绒梳妆袍，把头发拢到头顶上挽起个高髻，坐在床前那张椭圆形矮几后面，慢慢地品味着手里那杯波尔多红酒。她每天的早餐挺简单，只是一片薄薄的烤土司和一只煎蛋，但一大杯波尔多红酒却是不可少的，她感到那种在微甜中带着点酸涩的酒味，能使她一天中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正常的食欲，甚至还能使她心情愉快。因此，从她脱离了鸨母独立过生活时起，只除掉跟随高尔察克的部队一起行军的那两年里，每天早晨喝上一杯红酒，已成为她生活中的常例，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

楼上、楼下，和外面的走廊上，全都是静悄悄的，虽然五斗橱上那只鎏金台钟的时针已指到了10点20分上，但这幢三上三下的大房子里似乎只有她一个人醒着，其余的人都还在沉睡之中。这倒并不奇怪，这里的那些姑娘所过的本来都是夜生活，再加昨天晚上又在这屋里举行过一个宴会，停泊在外滩黄浦江里的那艘意大利巡洋舰“康铁浮第亚号”上的一些年轻军官，为他们的一个同事庆祝生日，约好到这里来举行宴会，一下拥来了20多个军官，中年人、壮年人和乳

臭未干的小伙子都有，全院里12位姑娘，不论高矮胖瘦全都让他们包了去。喝酒、跳舞、唱歌、拥抱、接吻，还有那桩嫖客和姑娘之间的事儿……一直闹腾到凌晨2点方才离去，底层那间大厅里留下了一片狼藉，到处是空香槟酒瓶和玻璃碎片，糖果纸扔得满地，沙发座垫上沾满蛋糕的奶油，墙角里还有几滩呕吐出来的秽物……看着这幅凌乱景象，真不由得使康司坦诺维奇夫人连连皱眉，但当她回想起刚才在里面闹腾的情景时，又不禁觉得有些好笑，在整间大厅里，意大利话、俄国话、法国话，还夹杂着那些蹩脚英语的中国话，乱成一片，也许谁都不明白也并不意味着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，只是由于兴奋和刺激忍不住要乱嚷一气罢了。但和其中一些年轻人打交道却是挺有趣的，在那个现在还保留着君主制的国家里，各种贵族头衔在普通平民中还是很受尊敬的，她还记得昨天夜里当一个到这里来逛过几回的航海官，把自己郑重地介绍给他的一位年轻同事时，那小伙子先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随即脸上出现了似乎是受宠若惊的神情，恭谨地弯下腰去拿起她的指尖，贴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下，用走了腔的法国话说道：“夫人，认识你十分荣幸……”

“伯爵夫人”，院里的姑娘、她的不少朋友，还有那些常来的嫖客都是这样称呼她的，虽然其中不少人都明白她这头衔是自封的，就像有些在马路上摇着八音音乐箱、耍着小狗向行人要钱的老人，也会自称过去是什么伯爵、男爵一样。既然都是无法查对的事情，并且也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害，那又何不把自己的历史涂抹得光彩些呢？